

四川民族地区“9+3”免费中职教育计划 实施十年再审视

郑 涛¹, 张 洋¹, 焦 蒲²

(1.四川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成都 610066;2.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教育发展研究所,成都 610222)

摘要:全面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是党和政府的庄严承诺。十年来,四川民族地区“9+3”免费中职教育计划秉持中职定位、公益立场、扶贫导向和融合目标,在增进民族团结、培养民族人才、助力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促进教育公平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但面对全面小康的新要求,其招生、培养、就业等环节的不足逐渐显现,同时亦面临其他替代性教育方案的挑战。为进一步发挥其政策功能,需要从提高站位、优化结构、提升质量、突出特色、加强保障等角度对现有模式进行全方位调适。

关键词:四川民族地区;“9+3”免费中职教育计划;十年再审视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20)06-0106-07

收稿日期:2020-06-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四川藏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路径研究”(18BJY11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四川藏区‘9+3’群体社会融入问题研究”(15YJC850026)。

作者简介:郑涛(1979—),男,四川乐山人,经济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三农问题、区域发展、教育经济与管理等;

张洋(1980—),男,四川大英人,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民族教育等;

焦蒲(1977—),男,四川达州人,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教育政策、农村教育。

四川民族地区“9+3”免费中职教育计划(以下简称“‘9+3’计划”)是指在 9 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组织民族地区初中毕业生和未升学的高中毕业生到内地优质职业学校免费接受 3 年中等职业教育,并尽力帮助其实现就业。该计划于 2009 年由四川省委、省政府在四川甘孜、阿坝藏族聚居区率先启动实施,2014 年扩大到大小凉山彝族聚居区,2016 年进一步覆盖到省内包括秦巴山区、乌蒙山区在内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鉴于其对民族地区长治久安和脱贫攻坚的积极作用,该模式先后被纳入《四川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和《四川省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十年行动计划(2011—2020 年)》,并通过“国家教育改革重大试点项目”,上升成为国家支持推广的教育模式^①。随着时间的推移,“9+3”计划的内容和形式亦随之出现变化。2020 年是四川“9+3”计划实施的第十一个年头,同时也是国家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战决胜之年,在此背景下,全面梳理其研究进展和特征,总结其实践成效,分析其自身不足及面临的挑战,并就其调适提出合理化建议,仍不失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①《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国办发[2010]48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2010 年 10 月 24 日发布,2020 年 6 月 5 日访问,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1/content_1786411.htm。

一 “9+3”计划研究概述

截至2020年6月5日,从“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文献检索结果中梳理发现,学界对“9+3”计划的研究主要呈现以下特点。研究对象上,文献高度集中于藏族聚居区“9+3”计划的研究,其中包括期刊论文150余篇、博士论文1篇和硕士论文27篇,而研究彝族聚居区“9+3”计划的文章则屈指可数。研究内容上,文献主要分布于两个板块。一是“9+3”计划学生对该计划的适应,包括文化适应、学习适应、就业及职后适应这三个方面,其中文化适应和就业及职后适应的关注度较高。文化适应方面,万华麒从情感、认知和行为三个维度分析了“9+3”计划学生文化适应的困惑,从心理预期、经验、语言能力、社会支持、歧视和偏见五个方面总结原因,并提出了相应促进策略^①;还格吉则借用巴瑞(John Berry)的双维度理论模型来分析“9+3”计划学生在不同的适应领域的不同策略,结果表明“在语言、饮食和装束等方面采取‘整合’的策略模式,在专业技能的学习上采取了‘同化’的策略模式,而在宗教信仰和日常伦理道德方面采取了‘分离’的适应策略”^②。就业及职后适应方面,文艳林调查发现,“9+3”计划毕业生“对社会的认识普遍较为积极,工作态度较为认真热情”,但在择业和就业地域的选择上,男女生差异较大,“他们对新的环境具有一定的陌生和压力感,表现为不敢多说话、怕出差错,怕被批评等”^③;郑涛等以社会融入的视角关注“9+3”计划群体的就业,通过对存在问题的梳理以及影响因素的分析,从管理机构、培养学校、家庭和社会层面提出了促进“9+3”计划群体社会融入的对策建议^④。二是“9+3”计划承担学校对该计划的组织实施,包括教学组织、日常管理、规范养成、实习实训等。杨小燕阐述了“9+3”计划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和造峰填谷的三点内涵,从入口、过程、出口三个环节解构了其人才培养本土化路径,并提出了转化动力、优化目标、凸显重心的发展方向^⑤;还格吉从藏族传统教育理念出发提出了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的方向和加强职业道德教育的建议^⑥。近两年的研究拓展到了如何加强“9+3”计划学生励志教育以及个性化分层培养上。

需要指出的是,鉴于“9+3”计划的民族职业教育属性,对其研究进展和实践绩效的考察亦不能脱离国家民族教育和职业教育发展的大背景。

二 “9+3”计划的核心特征

(一) 中职定位

尽管2002年的第五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已经达成“加快民族教育发展”这一共识^⑦,2010年教育部发布的《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行动计划(2010—2012年)》提出了要“推动西部民族地区中等职业教育跨越式发展”^⑧的创新行动计划,但各地在思路、机制、政策措施上鲜有突破,直至“9+3”计划被教育部认同并推广。

“9+3”计划既区别于普通职业教育,但又保留了中等职业教育的基本定位。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培养目标上,“9+3”计划定位为为民族地区培养技能型、实用型人才,因而“将目标锁定为因基础较差、基本功不够扎实或家庭条件困难等未能进入高中和内地西藏班的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⑨,以此区别于内地西藏班的各行业民族精英人才培养目标。其次,在管理方式上,虽然“9+3”计划的生源差异较大,但针对其绝大多数生源处于青春期、心智尚不成熟的特点,承担学校在日常作息和教学安排上仍采取统一封闭式管理;而针对具体情况,灵活采取了“先会后懂”“做中学、学中做”等分层施教方法。同时,专设民族教师驻校带班,以减轻

① 万华麒《四川省“9+3”免费中职教育模式下藏族学生文化适应研究》,《当代职业教育》2012年第1期,第87—90页。

② 还格吉《四川藏区“9+3”学生在蓉文化适应及对策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第75—80页。

③ 文艳林《规模化的民族跨区职业教育现状研究——以四川省“9+3”免费职业教育为例》,《职业技术教育》2012年第28期,第27—32页。

④ 郑涛、张洋、颜雪艺《藏区“9+3”学生就业中的问题与反思——基于社会融入视角的分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第113—120页。

⑤ 杨小燕《基于“本土化”的藏区“9+3”免费中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3年第33期,第88—91页。

⑥ 还格吉《四川藏区“9+3”职业教育内地办学的思考》,《中国藏学》2016年第3期,第235—237页。

⑦ 《第五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2020年6月20日访问,http://www.moe.gov.cn/jyb_sjzl/moe_364/moe_258/moe_412/tnull_5046.html。

⑧ 教育部《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行动计划(2010—2012年)》,2010年11月27日发布,2020年6月5日访问,http://www.moe.gov.cn/srsite/A07/s7055/201011/t20101127_171574.html。

⑨ 王珏翎等《民族教育发展模式创新——基于四川藏区“9+3”免费职业教育实践》,《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第87页。

“9+3”计划学生因异地求学而远离故土和亲人的焦虑,努力重构其情感支撑。最后,在实习实训上,通过第一年的文化和学习适应及第二年的技能操作规范化训练,“9+3”计划学生在实习实训环节除了享受专项补贴外,无论是实习单位分配、岗位职责要求、实习时间长短等方面都已经与同一学校的非“9+3”计划学生统一安排、同等对待。

(二)公益立场

作为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的创新举措,公益性始终被放在“9+3”计划的突出位置。首先,“9+3”计划率先实现了对教育对象的“免费”(早于国家层面“中等职业教育逐步免费”的提出)。对于“9+3”计划学生,除了免除学费,同时提供相应的生活补助,交通、住宿、书本等杂费补助,以及新生冬装补助。与此同时,“9+3”计划学生,整体被纳入当地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范围,甚至还购买了“学平险”。其次,“9+3”计划确保了教育资源的“优质”。以内地优质资源的异地共享,弥补民族地区的职业教育短板,是“9+3”计划的落脚点和发力点。因此,所有承担“9+3”计划任务的职业学校,都是经过认真挑选的省级甚至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在办学水平、教学设备、师资力量、生活设施上都堪称内地中职学校的标杆。最后,“9+3”计划兑现了对承担学校的“兜底”。除了对学生的各项补贴,对于“9+3”计划承担学校,财政资金每年提供生均500元的学生工作经费补助,并持续投入资金以不断改善其办学条件。10年来,内地先后有100余所中职学校承担“9+3”计划培养任务,中央和省级财政累计投入达20.73亿元,累计招收藏族聚居区学生5万余人和彝族聚居区学生近3万人,先后4万余人顺利毕业并走上工作岗位。^①

(三)扶贫导向

四川少数民族主要分布于边远地区和山区,由于诸多原因,历史上严重贫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央及四川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减贫工作,但受制于特殊的自然条件,脱贫形势严峻。《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明确提出“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扶持力度”,此后,党和国家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四川民族地区得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对口帮扶。但由于历史欠账较深,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尤其是职业教育发展长期滞后,并逐步成为制约当地扶贫整体效率提升的突出短板。

在此背景下,为积极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发展职业教育是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就业、改善民生、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是缓解劳动力供求结构矛盾的关键环节,必须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②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充分发挥职业教育在扶贫开发中的重要作用,围绕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需求,提高职业教育扶贫的精准度”^③的要求,“9+3”计划实施区域稳步扩大,并最终覆盖四川藏族和彝族聚居区45个深度贫困县。就个体而言,“9+3”计划的实施,使得民族青年得以掌握一技之长,相关家庭的生活状况在短期内得到改善。而从全局来看,该计划有效促进了当地劳动力素质的整体提高,为民族地区脱贫攻坚及防止返贫提供了长期保障。

(四)融合目标

多年民族团结工作的经验表明,民族地区人心向背的关键在民生。作为全国第二大藏族聚居区、最大彝族聚居区和唯一羌族聚居区,四川围绕民生谋发展,教育和就业无疑是重中之重。这当中,职业教育实现了“用教育方法,使人人依其个性,获得生活的供给和乐趣;同时尽其对群之义务”^④,而就业则肩负着将个人生存之技转化为社会发展之源的关键中介。

基于上述背景,“9+3”计划一直将融合目标贯穿全过程。首先,在招生环节,各级政府通过广播、电视、标语、资料散发、现场咨询等方式,以“双语”全方位宣传“9+3”计划的优势;同时组织“9+3”计划优秀毕业生现身说法,以尽可能实现与目标生源的同频共振。其次,在培养环节,针对文化基础较差的生源实际,承担学校采取

①《四川省民族地区“9+3”免费教育计划实施十年惠及8万余个民族地区家庭》,2019年12月30日发布,2020年6月5日访问,https://cbgc.scol.com.cn/news/211303。

②《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2010年7月29日发布,2020年6月5日访问,http://www.moe.gov.cn/srcsite/A01/s7048/201007/t20100729_171904.html。

③教育部等《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2014年6月23日发布,2020年6月5日访问,http://www.moe.gov.cn/srcsite/A03/moe_1892/moe_630/201406/t20140623_170737.html。

④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教育与职业》1934年第154期,第193页。

了结对帮扶等方式,以帮助“9+3”计划学生尽快跟上专业学习进度;考虑到文化适应,安排了来自“三州”的工作人员驻校带班,以促进“9+3”计划学生与学校之间的沟通;同时,为增进内地师生与“9+3”计划学生的相互了解,宣传民族优秀文化,承担学校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民族特色活动,打造了形式多样的双向交流平台。最后,在就业环节,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下,历经多年努力,“9+3”计划已建成完备的就业帮扶体系,形成了涵盖单招入伍、高职单招升学、内地推荐就业、公务员对口招考、资助自主创业等的全方位立体化就业渠道。截止到2019年10月,这些“9+3”计划学生中,先后有4.2万多人顺利毕业,历届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均在98%以上,其中5000多人通过定向招考充实到四川民族地区乡镇基层队伍,2000多人参军入伍,1万余人考入高职院校继续学习深造,60%以上在各类企业就业,50%以上的毕业生回到家乡就业创业。^①

三 “9+3”计划的实施成效

作为民族地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民生工程,“9+3”计划实施10年来取得了显著成效,集中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引导凝聚人心,焕新社会风尚

“9+3”计划紧扣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坚持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日常教学、管理,积极宣传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主动引导“9+3”计划学生从“知党”“信党”到“爱党”“入党”,早在2015年,已有近2000名“9+3”计划学生光荣入党,团员比例达87%^②。近年来,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生命教育、社会实践等活动的开展,“9+3”计划学生逐步成为新知识的代表、新文化的象征,给民族地区带来新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并在家规民约完善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所在家庭乃至村庄气象随之焕然一新。

(二) 增强国家认同,增进民族团结

通过“混班混住”“五项教育”等措施,“9+3”计划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逐步树立,其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得以提高。调查显示,95.69%的学生认为自己“不仅是藏(彝、羌、回)族人,还是四川人,更是中国人”^③。而“三个离不开”教育、结对帮扶、民风民俗宣传、“藏汉一家亲”等活动,则成功打通了内地师生与“9+3”计划学生之间的信任通道,使得“9+3”计划场域中的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两种错误倾向同时得到有效遏制,形成了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和视野,增进了民族团结。

(三) 充实人才储备,助推脱贫攻坚

“9+3”计划着眼民族地区优势特色产业发展和老百姓就业愿望这远近两个视界,培养了一大批“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的本土技能人才,改善了民族地区交通运输、医疗卫生、工程基建、学前教育、民族艺术等领域的人力资源素质结构,充实了民族地区的人才储备。截至2019年底,该计划已累计惠及8万余个民族地区家庭,其中来自偏远、贫困的农牧民家庭子女占90%以上^④,不仅从物质上明显改善了其生活状况,而且从精神上点燃了民族地区脱贫致富的希望;与此同时,30%左右的“9+3”计划毕业生在内地实现了稳定就业^⑤,缓解了民族地区自身的就业压力,助推了民族地区脱贫攻坚的进展。

(四) 促进教育公平,推动职教发展

“9+3”计划向四川民族地区完成义务教育的孩子再提供三年免费中职教育,并尽其所能地实现目标群体的“应读尽读”,切实保障了弱势群体的受教育权利,大幅提升了民族地区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水平(其中,藏族聚居区初中毕业生升学率由70%提高到90%左右)^⑥,极大地促进了教育公平。同时,由于承担“9+3”计划学生培养的都是优质成熟的国家级、省级示范和重点中职学校,使得民族地区学生直接共享内地优质职业教育资

①《民族地区“9+3”免费教育计划实施10年成效显著》,2019年10月8日发布,2020年6月5日访问,<http://www.sc.gov.cn/10462/10464/10465/10574/2019/10/8/0f318d5327184748a45b9e755f1c922b.shtml>。

②《四川省藏区“9+3”免费教育计划实施情况》,2015年10月16日发布,2020年6月5日访问,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zt/moe_357/jyzt_2015nztzl/2015_zt12/15zt12_fpx/201510/t20151016_213726.html。

③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四川民族地区“9+3”免费中等职业教育计划实施成效和发展路径研究(内部资料)》,2019年。

④《我省民族地区“9+3”免费教育计划实施十年惠及8万余个民族地区家庭偏远、贫困的农牧民家庭子女占9成以上》,《四川日报》2020年1月6日,第1版。

⑤该数据为笔者近年来通过对“9+3”毕业生就业的跟踪调研统计得出。

⑥《民族地区“9+3”免费教育计划实施十年成效显著 助力贫困家庭子女成长成才》,《四川日报》2019年9月29日,第14版。

源,不仅补齐了高中阶段教育发展短板,而且为民族地区中职教育提供了直接参照,有利于推动本土职教的发展。

四 “9+3”计划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实现小康,少数民族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掉队。”^①加快发展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是实现民族地区同步小康的必然要求^②。而站在决战脱贫攻坚和决胜全面小康的历史节点上,“9+3”计划却暴露出其自身不足,并面临新的挑战。

(一)“9+3”计划存在的问题

1.政策支持重视有所减弱

近年来,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民生不断改善,社会治安明显好转,民族融合不断增强。一些地方、职能部门和承担学校对“9+3”计划的重视程度有所降低,特别是在原设于教育厅的省“9+3”计划工作办公室被撤销后,相应考核评估和激励措施等有所弱化。而实际上,早在该政策出台之初,就有学者指出:“该工程虽然作为一项措施被纳入《四川民族地区教育发展10年行动计划(2011—2020年)》,就‘9+3’工程本身而言,并没有单独的长远规划和法律法规保证。”^③这与同为西部民族大省的贵州和云南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2.项目自身创新力度不足

一是专业设置不尽合理。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以来,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新的走向,不少区域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都已发生变化,而诞生于10年前的“9+3”计划,在尚未解决原有专业同质化问题的同时,又暴露出专业设置跟不上产业发展需求的弊端。例如,凉山州在“十三五”期间就已将旅游业明确为首位产业,而2020年四川省教育厅下达的“9+3”计划招生计划中旅游观光专业招生计划合计为480人,仅为计划招生总数5500人的8.36%,而汽车修理类专业招生计划合计为660人,为计划总数占比的11%(表1)。

表1 2020年凉山彝族自治州“9+3”免费教育计划招生计划

专业类别	专业名称	招生计划数	开设学校数
汽车修理	汽车运用与维修	540	20
	汽车维修	20	1
	汽车车身修复	20	1
	汽车维修	20	1
	汽车制造与检修	30	1
	汽车车身修复	20	1
	汽车电子技术应用	10	1
旅游观光	旅游服务与管理	300	12
	高星级酒店运营与管理	160	6
	观光农业经营(农学类)	20	1

数据来源:《四川省教育厅关于下达2020年民族地区“9+3”免费教育计划和面向藏区试办高中起点“1+2”模式高职教育招生计划的通知》,川教函〔2020〕186号。

二是培养质量有待提高。面对“9+3”计划学生存在文化基础薄弱、汉语水平参差不齐等情况,部分学校有针对性的人才培养方案不完善,重管理、轻培养,降低教学要求和考核标准,加之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等深度不够,人才培养质量与用人单位的需要存在差距。调查显示,内地用人单位对“9+3”计划毕业生的职业知识和技能满意率仅为21.58%^④。

三是就业压力逐年上升。出于管理难度、学习能力、文化基础等顾虑,内地用人单位主动选用“9+3”计划

①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6页。

②管培俊《民族地区同步小康与职业教育的使命》,《教育研究》2018年第2期,第4—9页。

③文艳林《规模化的民族跨区职业教育现状研究——以四川省“9+3”免费职业教育为例》,《职业技术教育》2012年第28期,第31页。

④四川省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四川民族地区“9+3”免费中等职业教育计划实施成效和发展路径研究(内部资料)》,2019年。

毕业生的积极性不高,多数“9+3”计划学生在内地工作一段时间后选择离岗返乡。然而,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民族地区就业吸纳能力有限,加之就业帮扶政策力度的减弱和专业不对口等因素影响,民族地区对于妥善解决回流“9+3”计划学生就业存在较大困难。

(二)新阶段的新要求与新挑战

1.全面小康新要求的挑战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和政府对全国各族人民的庄严承诺,而民族地区要同步实现小康,当务之急是摆脱贫困。而“教育扶贫通过发展脱贫能力,着眼于从‘拔穷根’上消除‘贫困’,是脱贫攻坚和精准扶贫的治本之策”^①。在此过程中,职业教育因为贴近就业、贴近产业、覆盖面广,发挥着缓解就业压力、支撑产业转型升级、维系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作用。这就对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首先是通过劳动者职业技能的提高,更充分地实现少数民族人口就业;其次是通过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的优化升级,更有力地推进区域特色产业等发展;最后是通过技能型人力资本的精准挖掘与深度开发,更有效地服务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显然,就目前“9+3”计划所处的状态而言,要达到上述要求,还面临不小的挑战。

2.替代性教育方案的冲击

民族地区群众选择“9+3”计划的原因很现实,概括起来无非三点:一是免费,二是就业帮扶,三是学历认可。而随着时间的推移,“9+3”计划在这三点上的优势已基本丧失殆尽。首先,随着中职免费教育政策的逐步推进,就读于“三州”本土中职学校的民族学生能够就地享受到免费待遇。其次,相比最初几年,近年来“9+3”计划学生就业帮扶力度大减。从2013年开始,甘孜州、阿坝州、凉山州针对“9+3”计划的公招定向指标逐年递减,与此同时“9+3”计划定向入伍的指标也在2015年后出现了大幅下降^②。最后,除了通过对口单招进入高职院校深造,“9+3”计划说到底只是个中职学历,而通过现行的“3+2”和“1+2”模式^③,学生毕业时就可直接拿到大专文凭,调研显示,这对“9+3”计划的生源构成了很大冲击。

表2 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近年职业教育招生统计

招生年度 招生类型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9+3”	460	664	527	521	384	462
“3+2”	3	5	4	8	455	204
“1+2”	96	94	53	27	8	4

数据来源: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教育体育和科学技术局。

五 基于可持续发展的“9+3”计划因应调适

推进“9+3”计划的可持续发展,应根据国家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发展战略和我省“一干多支、五区协同”等重大部署,站在促进民族地区安全稳定、脱贫致富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高度,贯彻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关于办好深度贫困地区职业教育助力脱贫攻坚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精神,按照提高站位、优化结构、提高质量、突出特色、加强保障的要求,对现有模式进行全方位主动调适。

(一)提高站位,坚定推进实施

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当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战略思想,深刻理解四川作为传统治藏依托的特殊价值,充分认识“9+3”计划对于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大意义,坚定不移地推进实施。同时,应切实解决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①杨小敏《精准扶贫:职业教育改革新思考》,《教育研究》2019年第3期,第126页。

^②郑涛、张洋、颜雪艺《藏区“9+3”学生就业中的问题与反思——基于社会融入视角的分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第117页。

^③所谓“3+2”是指分段中高职贯通培养,又称中高职衔接五年贯通培养,是由部分重点中专学校和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经省有关部门批准联合举办、招收应届初中毕业生,完成(三年)中专学业后经考核转录高职(两年),毕业后发给大专文凭。“1+2”是指高等职业院校招收民族地区高中起点高职教育学生,目前仅面向四川“三州”藏族聚居区试办。

不断完善其政策设计。一方面,通过推动民族地区现代职教体系的构建,以实现“扶民族地区教育之贫”;另一方面,通过确保更多民族困难群众的精准受益,以达成“依靠教育扶民族地区之贫”的目标。

(二)动态调整,不断优化结构

一是优化学校布局。对当前“9+3”计划承担学校的办学基础条件和人才培养质量进行综合评估,保留优势突出、生源相对集中、管理到位的任务学校,而对于不能胜任承担培养任务的学校要及时中止其资格,实现动态调整,健全退出机制。二是优化专业结构。积极落实精准扶贫理念所提出的“识别精准、帮扶精准”要求,严格遵循“因地制宜”原则,紧密围绕中央战略(如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四川省整体布局(如川西北生态示范区绿色发展的功能定位)及生源地经济社会发展(如川藏铁路建设与运营)状况,及时调整招生专业设置。三是优化生源结构。根据甘孜州、阿坝州、凉山州、乐山“两边一区”的生源基数变化和人才需求情况,统筹调配“9+3”计划招生计划,确保到校1万人招生任务的有效完成。

(三)整合资源,着力提高质量

一是要整合校企资源。“9+3”计划承担学校要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一方面加快培养双师型教师队伍,另一方面推进实施校外导师制度;一边把课堂搬进车间、客房等工作一线,一边让厂矿、酒店等变身实践教学基地。如此双管齐下,促进校企“二元”育人。二是整合帮扶资源。以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动计划为契机,争取发达地区优质职业学校加大对“9+3”计划承担学校的帮扶力度,健全跨区域协作的长效机制。通过双向人员交流,全面提升承担学校的师资、课程、管理、研究水平;通过内容重构、方法创新和管理再造,全方位提高“9+3”计划学生培养质量。三是整合市场资源。在政府治理转型背景下,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政府主导的局面将发生新的改变。一方面,政府部门既要通过教育权力下移和教育权力分化,实现自身治理机制的优化;另一方面,民族地区教育发展中呈现出的诸多复杂问题也需要社会组织、市场机制的积极参与。^①

(四)突出特色,实现错位发展

一是坚持中职定位。在民族地区本土中职教育长足发展和内地西藏班开办中职班的双向挤压下,“9+3”计划在自身定位上应通盘考虑,在生源、学制、专业设置、就业出路上以错位求发展,避免同质化竞争。二是借力民族文化。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传承民族文化,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三大社会服务功能。^②在国家大力推进全域旅游发展、打造藏羌彝文化走廊、启动长征文化主题公园建设的东风下,“9+3”计划应顺势而为,主动对接需求,建成一批民族文化遗产创新示范基地,并以此带动专业建设和专业发展。三是推进订单式培养。承担学校应深入研究产业梯度转移规律和民族地区承接实际,主动加强与地市、园区、产业、企业的沟通协调,大力推进订单式培养,将就业工作前置,提高毕业生民族地区就业质量。

(五)加强保障,完善跟踪服务

一是保障就业帮扶。主管部门应加强对“9+3”计划毕业生内地就业吸纳的税费减免、贷款担保折扣等措施的研究、出台,强化落实,提高内地企业接收“9+3”计划毕业生的积极性,拓展“9+3”计划毕业生内地就业渠道。二是加强跟踪培养。对于已经实现稳定就业,甚至在工作中崭露头角的优秀“9+3”计划毕业生,利用国家“高职扩招一百万”的契机,确定一定的招生名额,鼓励和支持其以弹性学制的形式进入高职院校学习深造,拓展其成才空间。三是健全职后培训。州县人社部门要加强对“9+3”计划毕业生回州后就业情况的掌握,对未能稳定就业的学生有针对性地提供就业信息和技能培训,提高其就业能力,帮助其尽快实现再就业。

[责任编辑:罗银科]

^①李祥、曾瑜、宋璞《民族地区教育精准扶贫:内在机理与机制创新》,《广西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第201—206页。

^②巩红冬、鲍嵘《空间正义视角下的职业教育民族文化传承功能及其发挥》,《重庆高教研究》2019年第3期,第39—48页。